

“生活在郑州是一种幸运，这片土地给了我文化滋养”

——著名作家李洱漫谈文学与城市的温柔羁绊

本报记者 苏瑜 李居正



与读者分享写作历程

文学的本质：更慢、更低、更弱

李洱提出的“文学是更慢更低更弱”的命题，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对文学本质的深刻洞察。这一观点与体育精神中“更快更高更强”形成鲜明对比，逐层解构了文学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取向。

“更慢”的维度指向文学创作的时间性特质。李洱强调，写作必须沉潜、耐心、反复推敲，不能追求速成。他以杜甫的经典化历程为例，指出杜甫在唐代名人荟萃的文坛属“末流”，至宋代方完成初步经典化，其全球经典地位的建构更是历经漫长过程。这种“慢”不是效率低下的表现，而是对生命质地和语言精度的敬畏，是文学价值在时间沉淀中显现的必然过程。李洱认为，在当下快节奏的媒体环境中，“读书也需要慢”，因为“快了之后，我们什么都记不住”。

“更低”的维度强调文学必须俯身贴近大地，扎根现实土壤。李洱解释，这不是贬义，而是指文学要“擦干净大地”，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现场，而非悬浮于云端。他以《红楼梦》为例，指出这部作品“写大观园里的丫鬟、婆子、小厮，写他们被忽略的悲欢与尊严”。在李洱看来，文学的价值不在于高蹈的宏大叙事，而在于对具体生命经验的细致描摹，对“人情冷暖”的深刻体察。

“更弱”的维度体现为一种谦卑的文学姿态。李洱指出，这是主动选择不以征服者自居，而以体察者、同情者身份去关注那些易被遮蔽的微弱声音，关心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困顿与韧性。他强调“作家关心的人也是失败的人”，像郑成功这样的人也关心“引车卖浆之流”。这种“弱”不是软弱，而是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对多元价值的包容，对文学人文精神的坚守。

在李洱看来，“更慢更低更弱”的文学观最终指向一种参与性的文化实践。他将中国现代化进程比喻为“一部由全体中国人共同执笔的、尚未封笔的成长小说”，每个读者都是主人公，每次思考都是续写，每项建设都是章节。这种文学观超越了个人修养的范畴，成为塑造民族未来的创造性实践，体现了文学在当代社会中的独特价值和使命。

郑州第二故乡：文学观的实践场域

郑州不仅是李洱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更是他文学观的重要实践场域。他在接受采访时直言：“生活在郑州是一种幸运，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风俗语言能给作家多方面的滋养。我对人世间的了解，在郑州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

在《风物郑州》序言中，他不仅展现了自己对郑州这座城市的深厚情感，更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文化意象，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立体多维的郑州形象。

李洱特别关注郑州的山水景观，认为这些景观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他描述嵩山是“最早从海水中露出的陆地”，后来成为“儒道释三教荟萃之处，香客麇集之所”。这一描述将嵩山从单纯的地理景观提升为文明起源的象征，而作为嵩山所在地的郑州，自然也就成为中华文明发源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李洱将黄河描述为“中华文明的血脉”，而郑州正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是黄河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李洱甚至能够从黄河的涛声中听到文化的韵律：“因为它穿越了乐府、汉赋、唐诗、宋词和元曲，所以如果你侧耳细听，你便能够从黄河的涛声中听到宫商角徵羽的韵律。”这种将自然河流与文化历史相联系的意象处理，使黄河从地理景观升华为文化象征，成为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流淌的精神象征。

李洱对郑州水系景观有着特别的情感。他将贾鲁河、索须河比作“黄河派到郑州，深入百姓生活的使者”。在个人体验层面，他回忆道：“我在郑州任教时，常在暮春的傍晚沿贾鲁河走。”这一个人记忆，不仅展现了作者与贾鲁河的情感联系，也通过“暮春的傍晚”这一时间意象，营造了温馨而富有诗意的氛围。李洱对贾鲁河的描写有着特别的情感：“百花长恨风吹落，唯有烟花独爱风，因为它想以婀娜的舞姿飘向河面，让贾鲁河变成洁白的少女。”这一拟人化的描述，不仅生动地描绘了烟花飘舞的景象，也通过“洁白的少女”这一意象，赋予了贾鲁河以纯洁和美丽的象征意义。

他高度评价《风物郑州》的作者们——郑州日报社的数十位记者，他们“用半年时间跑出了七十多篇文字”。这些记者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化精英，而是深入基层、贴近生活的记录者。李洱描述他们“沐浴过嵩山的晨露，踏入过黄河的泥沙，倾听过公园老人们的闲谈”，这些生动的描述展现了记者们深入生活、贴近民众的工作态度，正是“更慢”“更低”“更弱”文学观的生动体现。

李洱特别赞赏记者们“等得起”的耐心，认为这是“对生活的敬畏：不急于把园子说透，而是慢慢等，等园子把故事讲给你听”。这种对时间的尊重和对待过程的珍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法自然”思想和“天人合一”理念，也呼应了“更慢”的文学观。李洱描述记者们为了写园，“春天拍花，夏天记浓荫，秋天收落叶，冬天录雪景——把四季的园子拼在一起，才是园子真正的模样”。这种对完整过程的尊重，正是“更慢”文学观的具体实践。

李洱还特别关注郑州城市更新中的文化细节。他赞赏记者们不仅记录了大型园林，“连街角的口袋公园都没放过，写拆墙透绿后，老人在园子里下棋，孩子追着泡泡跑的样子”。这些对普通市民生活的关注和记录，体现了“更低”文学观——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记录被忽视的细节。李洱认为“一座城的好，就在于把历史和未来联系在一起，也把自然和人文联系在一起”，这一观点体现了他对城市发展的深刻理解和传承文化的高度重视。

从某种意义上说，《风物郑州》这本书是李洱“更慢更低更弱”文学观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城市文化实践的一个小小载体，在郑州这座城市的山水之间、市井之中，李洱的文学理念得到了生动体现，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理解和感受城市文化的新视角。

2026年4月19日，郑州市第十三届绿城读书节的现场座无虚席。当李洱走上讲台时，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这位茅盾文学奖得主没有急于展开演讲，而是先向听众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意味深长的问题：“文学是什么？”在短暂的沉默后，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体育是更快更高更强，文学则是更慢更低更弱。”这一命题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也奠定了整场讲座的基调。

李洱的这次郑州之行不仅是对文学本质的思考，也是对他与郑州这座城市20年情缘的深情告白。作为《风物郑州》的序言作者，李洱坦言“郑州是我迄今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我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是在郑州度过的”，并把郑州称为“我的第二故乡”，说这座城市给他的记忆是“长远的”，深刻地影响了他“观察和理解世事人心的方式”。这种深厚的情感连接，使他的文学观与郑州文化实践形成了独特的对话关系。

李洱对经典重释与跨文化传播的思考，体现了他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和全球视野。在他看来，经典不是封存在玻璃柜里的标本，而是流动的河，需要不断重新解释才能获得新生。这种重释不是简单的复古或怀旧，而是通过跨文化对话，使经典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李洱以杜甫的经典化历程为例，生动展示了经典生成的历时性。他指出：“杜甫在唐代名人荟萃的文坛处在‘末流’。他在中国的经典化的初步完成是在宋代，而其世界化则是因为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等学者将其‘放在人类文明坐标系中解读’。这一历史事实颠覆了人们对经典形成的固有认知——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重新解读和评价的。同样，《红楼梦》在20世纪30年代前‘没有人认为是一部经典作品’，直到批评家将其与《堂吉珂德》《战争与和平》《人间喜剧》并置比较，才确立其世界文学经典地位。然而，当前西方读者中仅约1%认可其价值，这凸显了跨文化阐释的紧迫性。”

李洱认为，这种接受差异源于《红楼梦》所承载的“绝望中孕育新生”的文化密码难以直译——例如书中“无数人死亡却无一人生”的极端绝望，实则是曹雪芹对封建秩序解构后新人出路的哲学叩问。“所以更需要我们大量地阅读，我们才能把我们传统的文化带出去。”

李洱对《红楼梦》未完成性的解读展现了他独特的文学视角。在他看来，《红楼梦》的未完成并非因曹雪芹病困潦倒所致，而是源于一个更为深刻的思想困境——曹雪芹不知道宝玉以后该怎么办。这一判断基于李洱对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结构的深刻洞察：在《红楼梦》之前，古典小说大都遵循闭环逻辑，主人公终将回归既定秩序——或科举入仕，或归隐山林，或修道成仙，本质仍是父权制与封建伦理的再生产。

李洱指出，《红楼梦》的革命性在于它首次以13-15岁少年为主角，打破此前小说皆以成人为中心的闭环结构，构成对封建秩序的根本性质疑。贾宝玉拒绝走传统道路：既不愿做贾政那样的官僚，也不愿效法西门庆经商逐利，甚至抗拒高鹗安排的“出家”结局——因为小说里一僧一道本是被曹雪芹刻意写成“最脏”的存在，若让最洁净的宝玉被最污浊者带走，等于否定全书对纯真价值的坚守。这种“写不下去”的困境，在李洱看来恰恰是《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它把“人该如何活着”的终极命题悬置下来，交还给每个读者。

在跨文化传播策略上，李洱主张建立双向阐释机制。他认为，重释经典必须采用可通约的阐释路径：需借镜西方批评方法（如形式分析、比较文学范式），与国际学界展开有效对话，方能使中国经典真正成为世界文学谱系中的活性存在。但这种对话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解释权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工具可以借用，立场不可让渡”。例如，在解读《红楼梦》“太虚幻境”的结构张力时，可以联系《庄子》齐物思想与佛教色空观，而非简单套用弗洛伊德理论。

李洱将经典重释视为动态的“河流”而非“标本”。他以梁启超为例，说明如何通过语义重构实现文化转型：梁启超将“炎黄子孙”的家伦理概念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共同体，又在《少年中国说》中将“少年”从生物学年龄转化为民族再生的符号，这种语言翻新实为文明转型的先导。李洱认为，当代文化传播需延续这种创造性转化，例如推动杜甫、《红楼梦》等文本的多语种译介与比较研究，同时强化基础教育中的经典语义史教学，引导青年辨析“青春”“少年”等关键词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政治哲学内涵。

同样，郑州作为华夏文明发源地、古都，其嵩山、黄河等文化IP的跨文化传播，也可以借鉴经典重释的思路，在守住文化解释权的前提下和国际语境对话。李洱认为，有时我们更需要换一种眼光，对某些关键词进行重新解读，让对话得以在多个维度上展开。“我相信，这样既能为本地人带来更丰厚的滋养，也能让郑州文化、河南文化更好地向外传播。”

经典重释：跨文化对话的路径



题签现场近距离与读者互动

等风：未完成的成长小说

“更慢”提醒我们在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耐心和定力，不急于求成；“更低”提醒我们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重视基层实践；“更弱”则提醒我们保持谦卑和开放，尊重多元声音。

在郑州这座城市的山水之间、市井之中，李洱的文学理念得到了生动体现。当“作者、读者和这座名叫郑州的大城，就会你中有它，它中有我，我中有你，幸福地融为一体”时，文学与城市、个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就能实现和谐共生。这种状态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就像一部永远在写作中的成长小说，充满了可能性与希望。

从嵩山到黄河，从贾鲁河到人民公园，从《风物郑州》的记者到普通市民，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着这部“成长小说”的写作。正如李洱在《风物郑州》序言的结尾所说：“翻开这本书的人，有福了。”这种祝福不仅是对读者的善意，也是他对参与文化创造者的肯定——他把手这块石头——不张扬，不修饰，安静地立在汉语的河床上，等待着下一次风从嵩山吹来。



题签现场近距离与读者互动

记者手记

温文尔雅 让访谈变得“柔软”

“快点，快点，李洱先生已经入场了。”
“书呢？我们的《风物郑州》呢？拿一本，快去拿一本过来。”

风风火火，急急忙忙，从奔波一线的“老记者”，到久经沙场的“老编辑”，都不知道今天上午的访谈活动会和这位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更何况，专访之前还有讲座、赠书、签售等一系列活动。眼看时间直奔上午11点而去，早晨的忐忑又在时针分针的催促下滋生出几分焦虑。

“这么多活动，李洱先生讲座结束会有时间接受采访吗？”“这本书在他心中的重量到底能有几何……”不久，随着这位身着深蓝衬衣，头戴无框眼镜的作家在讲座开场就援引《风物郑州》作序时的种种回忆，我们心中的石头怦然落地：“看来，咱们还是低估李洱先生对郑州的感情了。”

书本中，李洱就曾在序言表达了郑州作为自己“第二故乡”的深厚感情。在嵩岳古柏、在梅山远眺，在城水相依、在市井游园，这些由记者看到的、听到的、记录到的，这些李洱先生去过的、感受过的、还未听闻的，都在这部由郑州日报社和中共郑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共同策划的图书中一一呈现。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无论是签售环节《风物郑州》上的扉页落笔，还是一路走向采访室的交流攀谈，李洱先生签得缓慢，说得温和，言行之间，不久前的焦虑就在这种氛围下逐渐消散，期待与这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来一场关于文化、关于郑州的“思维漫谈”。

当访谈开始，李洱先生谦和平顺的气质，更是给在场的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记者近身为他佩戴耳麦时的从容不迫，到面对各种提问时的侃侃而谈，自始至终，李洱先生都气定神闲，用娓娓道来的表述，诉说着他与郑州的情缘。

“看完《风物郑州》，让我增加了对郑州的了解，包括对郑县的历史、人文的描述，都让我非常感慨。”“对小说家来讲，生活在郑州我认为是一种幸运”“郑州是个无尽的宝藏”……金句不断，真情流露，李洱温文尔雅，我们的采访顺利进行，那些面前的焦虑与急躁，都在这些平静与温和中，走向了尾声，并获得了安宁。

或许这就是名家大师的翩翩风范，或许这就是独属于中国文人的温润情怀。

本版图片为 陈云良 摄